

十四 帝王陵

1987年秋天，我父亲的堂哥张立教坐下来给东北两个省的政协写了一封信，标题是《关于张莘夫墓碑急需刻字的情况》。立教希望能给四十一年以前死去的叔叔墓碑刻上铭文。

张莘夫是我叔父。我诚恳希望他墓碑刻字的问题能够尽快解决，此将有助于我们海外统战工作。

这封手写信件的初稿长达十二页，立教的孩子们给了我一份。他们没能给我讲我们家的故事，但在这几张草稿纸上，立教把一切都列明出来——我祖父在美国生活的记录，对中国采矿业的贡献，他被刺杀和埋葬的历史，立教的个人历史记录。

墓前有一块小的黑色大理石，刻有铭文**张莘夫之墓**，每个字大约十厘米见方。墓前右方有一块碑，碑上

未刻有任何文字……

1948年秋，沈阳解放。在北陵，近下马石的地方就是张莘夫墓的遗址，还有一块没有字的墓碑……李芴衡带着孩子去了台湾……她的侄子张立教留在大陆，没有跟他们同去。1949年1月以后，他跟他们失去了联络。

1979年，三十年之后，立教第一次回到了这块墓地。坟墓已没有了，我祖父的遗骨也已散落无踪。但那块无名碑留了下来——正如我祖母所预见的，空白无字保护了它未受伤害。立教在信中请求政府批准，修缮坟墓，重新竖立一块刻有铭文的碑。因为这个墓位于一座公园中的显著位置，这件事是他一个人所无力完成的。

张莘夫的次子和长子都深深地爱着我们的祖国，曾多次回国，投身祖国建设……据说最近党中央提出要加强海外统战工作，广交朋友，争取支持。

所谓“统战”，指的是共产党赢得党外中国人支持的政策，包括住在香港，台湾和海外的华人。立教经历过许多的政治运动，深知他以个人名义代表他的叔叔这样提出的请求不会起太大作用。必须得诉诸爱国意识，关键是要把此事描绘为了一件国事，而非家事。我祖父的一生都被硬塞进了这样一个框架之中，如今他已死去，依然如此。

官方机构并没有立刻回复。两个月之后，立教又写了一封信，请求当局支持他的要求，并且说得很清楚，他将承担碑刻的全部费用。第二年 11 月，得到批准以后，我祖父的坟墓原址终于立起了一块新的墓碑。立教又写了最后一封信，题目是“我和海内外亲人多年的梦想终于实现了”。

因为这块无字碑终于变成了有字碑，我们的后人将有个地方可以拜祭先人。为此，他们甚感幸运。

就在我去哈尔滨拜访他家人之后不到一年，立教伯伯于 2006 年 2 月逝世。他年寿够长，可以看到三个孩子都在他曾任教的大学里找到工作，安顿下来，还有一个孙女也进了这所大学。1985 年，他曾获得省的一级教学奖，是这所大学唯一一位获此殊荣的人。对他的家人来说，这多少冲淡减缓了他曾受的痛苦。“我父亲能从那样的时代走过来，我觉得，就说明他的心很大度，”他的女儿银桥对我说。“大家都称赞他为人正派。有四百多人参加了他的葬礼。我们没料到会来那么多人。”

直到他生命结束，银桥说，立教一直都相信共产党。他从来不说政治斗争逼得他父亲自杀的事。对自己的遭遇也不去多想。我父亲曾告诉我说，有几次他曾问起立教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经历，但立教不肯说。“我相信立教哥是真的被洗脑了，”我父亲说。“无论什么时候他说起这些，只会说情况多好，共产党多好。我相信他是吓透了，直到生命終了。这

样的人很多，他们过去受的苦太多，觉得现在也不过是另一场政治运动。他们始终没法相信，过去的一切不会卷土重来。”

立教的女儿有不同的解释。“我父亲从没跟你父亲谈过这些，”她对我说。“我认为，他是觉得你父亲生活在海外，而这些是我们国家的家丑。”按照她的想法，不是恐惧，而是羞愧，才令她的父亲缄口不言。

* * *

2005年的最后一天，我去沈阳的一个公园拜望祖父的墓。冰冷的早晨，空气中混杂着煤炭燃烧的气味，太阳升起来，冷冷的有些苍白，像只柠檬。公园里人不少，多数是退休的人。老头们有一搭没一搭地慢跑，老太太们练太极。我在一个步行桥上停下来，看着脚下的湖。有人把积雪扫空，腾出一块大大的椭圆形场地。人们像专业运动员那样躬身滑冰。一个已过中年的女人身上裹了一层又一层，脸上还蒙着医用口罩——在沈阳酷寒的冬日，这是种常见的配饰。我在看着的时候，她试图单足着地，一条腿往后伸开，向前滑行。她差一点摔倒，又站稳了，四下看看有没有人注意。

我继续走，终于到了下马石，有两块石柱，用满清镌文标明，这里是通往清朝皇陵的神道。偏左边，我看到一片被松树围绕的小空地，祖父的墓就在那里。

墓碑大约有六米高，是灰色混凝土造的，上面刻着红色的汉字：

张莘夫先生纪念碑
中国矿业工程师
祖籍吉林省九台县六台村
1898—1946 年

我慢慢地读着铭文，一字一字地读，这让我感到安慰。墓志铭一共只有四行，包含了最基本的事实——但全都是真的。没有一句歪曲造假；政治并不曾侵入到这篇文字的写作之中。如果你只能用三十五个汉字来描述一个人，那么这算是写出来他一生的重点——生卒年份，工作，祖籍，和他的姓名。

我站在那里看着那块碑，不知道这样的场合我该做什么。我没有磕头，也没有烧香上供；我只是立在祖父的墓前。没有人打扰我。几个男人在下马石附近踢毽子，但他们没理会我。最后我只好离开，因为天太冷了。

我离开的时候，一个男人骑着自行车经过。他的车后面绑着一个录音机，播放着当年最红的民工歌曲；在那遥远的地方，每条街上都有一家厂，而历史博物馆一个字也没有提到过毛泽东。

我爱你
爱着你
就像老鼠爱大米
不管有多少风雨

我都会依然陪着你

回想祖父的一生，我为他失去的机会特别感到难过。他年轻时离开家——去北京，去美国——去求学，为了报国。他奔波在异国他乡，努力地找寻人生的方向，始终都在刻苦工作。他是出于责任感，才不顾别人的警告，毅然去抚顺煤矿。最后的那个冬夜里，当那些武装士兵登上他的火车，用刺刀捅他时，他所有的学识和努力都化为乌有。那是最原始的一种暴力；在这样的武器面前，一个人的理想抱负已毫无意义。我祖父死后，他一生追求的中国的前瞻远景也被灭了。

但事情之所以会发展成这样，并不偶然。我读祖父的日记时，或眼看着一群成年人在乡村婚礼上围攻敏和她姐姐的时候，感觉自己一次又一次见证着中国错误的问题症结所在。家国观念高于一切，许多人为它所困——几百万又几百万的人——过着远非自己所选的生活。若不是为了国家，我的祖父就不会成为矿业工程师，就不会去抚顺矿地。但他生来就背负着身为中国人的担子，因此他就做了这些事。正是同样的原因，张立教和赵鸿志在 1948 年秋天才留了下来，也因为同样的原因，我父亲才如此压抑自己的情绪，大姑姑蔼蕾才藉诗歌来抒发情感，立教的孩子才对过去轻描淡写。只有张宏选择记住，而这记忆已让他受尽折磨。

也许，我本人也比自己认定的更为中国化。因为现在我更能理解他们——理解为什么一个人决定不把她的故事讲出

来，又或是无法讲出来，也许不能承认任何的情感，因为不然的话，这情感将把你吞噬。我现在理解了蔼蕾姑姑追思父亲的诗，在诗中，她尽力克制自己的情感，将个人的伤痛化为一种得体，有意义的方式表达。但到最后一句，她失败了——我恨啊！爸。——情感喷薄而出，让隐藏的伤口，突然暴露在世人面前。

了解家庭的历史也改变了我对南方工厂城市的看法。敏和春明的民工世界里有许多东西让人无法喜欢：拜金主义，腐化，日常生活的粗鄙。但现在终于有机会可以离开你的村子，改变你的命运，想象一种不同的生活而且能实现它。我祖父当初梦想的旅程正是今天成百万的青年人每天都在做的——他们离开家；他们走进陌生的地域；他们拼命工作。但如今，他们的目的不在改变中国的命运。他们关心的是自己的命运，为自己作决定。如果这世界丑陋，至少这是他们自己的世界。

也许 20 世纪的中国必得经过这样一番可怕的错误，人们才能重头来过，这一次他们探求各自的路，将家国历史这些重担抛在一旁。有很久，我认为东莞是一个没有过去的城市，但现在我认识到，不是这么回事。过去一直都在那儿，在提醒我们：这一次——也许，希望，哪怕困难重重——我们会走对。

* * *

最后一个跟我谈到家族历史的是姑姑蔼莹，她是我父亲

的小妹。她父亲去世的时候她才七岁；关于父亲，她只记得一件事：他从外面回到家，新留了小胡子，爸爸亲她的小肚皮，逗得她笑个不停。

祖父去世之后，我祖母一直带着这些孩子。在葛荃太累，不想读书的时候，她母亲会对她说，“你父亲为国捐躯，你必须得用功，才能像他一样。”北京当时有十二条电车路线，都是以国家烈士的名字命名；我伯父立豫还记得小时候乘坐过张莘夫电车。抚顺地区有个矿叫做莘夫矿，沈阳有条路叫莘夫路，他的火车被迫停车，他惨遭杀害的小站，后来被命名为张莘夫站。我祖父死后，名字刻进了祖国大地。后来，共产党掌权之后，所有这些名字又都变了。

葛荃姑姑在台湾读中学的时候，有一次全班去参观烈士照片展览，看到一位被杀害的人，有文字说明他是如何被害，还有他遍体鳞伤的尸体照片。“我心想，‘真可怜哪’，”葛荃回忆道，“接着我就看到了我爸爸的名字。”她晕倒了。那些照片是政府的反共宣传，但葛荃以前从没看过。她连父亲的脸也认不出——只认得名字。

在离开中国的兄弟姐妹中，葛荃是唯一成年后还曾跟母亲亲近相处的。她的姐姐们出国之后，她单独跟妈妈度过一些时间，听了许多关于她的故事。后来葛荃也去美国求学，我祖母去世那年夏天，她又回到台湾去陪伴母亲。许多人跟我分享了他们的记忆，但葛荃姑姑的不同。在她的讲述中，母亲是个独立女性，反抗传统，渴望着出国旅行；她的父亲是个年轻的叛逆者，当初他的理想主义爱国热情跟家庭拉开

了巨大的鸿沟。我祖父那一代人的负担，在于他们从政治观点来看一切，但蒿莹的故事描画了他们生命中个人的一面。

抱恨终天。好几个人曾跟我说过这个词，据说这几个字绣在我曾祖父入葬时穿的衣服上，表达了他对于日本占领东三省的遗恨之憾。但蒿莹的解释不一样。当初我祖父在美国留学七年之后回到家，他父亲希望他留在六台掌管家业；可这个年轻人仍决意要离开家，父亲发怒了。日本入侵切断了父子间的通信，他们一直没有机会讲和。“他是为对待孩子的方式感到遗憾，”我姑姑说。她讲的我祖父死去时的故事也不同。据我听过的几种叙述，当他身受重伤，生命垂危的时候，我祖父仍想着他对国家的责任。我是中央政府派来的，他说。为国捐躯，我死而无憾。但蒿莹告诉我，他曾试图在一张纸上，蘸着自己的鲜血写字。他那一队里有一人得以平安归来，他把那张纸给了我祖母。上面只有草草几个字。“我妈妈没法辨认太多，”蒿莹说，“但她认得出自己的名字。”

在我听过，读到过的关于祖父的一切之中，我无法寻到他个人的踪迹——他全部的生命似乎都专注在救国这一件事上。他的书信和日记里显现出来的就是这样一个形象。我希望能喜欢他，但关于他的东西我读得越多，仿佛与他就越隔阂。他就像一个消失在自己故事里的人，在我看来，这太糟糕了。但也许，除了蒿莹姑姑告诉我的那一点微弱闪烁的东西之外，还有更多我看不到的。

我本没打算跟葛莹姑姑谈，因为她当时年纪太小，不太会记得父亲的生死这些事。我跟父亲，葛蕾姑姑，立豫伯伯，立教伯父的家人还有许多别的亲戚都谈过。他们讲到过去的时候，都会模糊含混。

我们对家史了解的不多。我们从来都没有机会谈到这些。

事实上，我对中国的认识很肤浅。

我祖父的父亲，没有人知道他的名字。

我跟所有这些人谈过之后过了几个月，小姑姑葛莹有一天打电话给我。她听说我在写一本书，她想跟我谈谈我的祖母。

“我来告诉你，”她说，“我的哥哥姐姐都不像我那么了解你祖母。”我从没想到过要问祖母的事。她从来没有远离开家；没有留下任何书面的记录。有多少可以去了解？但关于我家的历史，许多最生动的细节——祖母跟她公爹的矛盾，祖父遭到家法责打的故事——都来自葛莹姑姑。我们第一次通过电话之后，姑姑给我发了一封电子邮件。里面透露的情感跟家里别的人所表现的都完全不同。

我母亲（就是你祖母）来自一个非常传统的中国家庭，家教很严。她受过高等教育，在当时的女性是很不寻常的。后来她的事业非常成功。在条件很差，资源很少的情况下，她几乎是一手带大了几个孩子，给他们很好的教育。我非常爱她，对她充满敬意。我真正了解她

是在哥哥姐姐们离开家之后。

我们上次简短交谈之后，我开始思考中国女性不得不面对的那些变幻和挑战，也许正因为如此，中国女性才这么坚强。在我们家，奶奶，我，还有你，我们三代人的生活跨越了全世界，尤其是中国，变化最大的一百年。我们做出牺牲，受过苦，我们站起来了。

期待着你的来信，跟你谈谈。

爱你的

葛葢姑姑

小姑姑对我说她现在是“半退休”状态，她是一家美国生物科技公司的首席执行官。可我还是得早一个星期预先跟她约好访谈的时间；她的丈夫已经完全退休了，负责帮她安排后勤。在今天的中国，我姑姑这样的女性被称作女强人。在约好的时间，我拿起电话，打给葛葢姑姑，她是这样开始讲的：我要把我知道的都告诉你。